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
汗也撒泪也流，昂起头向前走。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劳动创造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



文化与命运

吕途 著

中国新工人

法律出版社

中国新工人

吕途 著

文化与命运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 吕途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18 - 6910 - 4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工人—文化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D4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2062 号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吕途著

责任编辑 高山 李峰云
装帧设计 马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版本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印张 16 字数 321 千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6910 - 4

定价:4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工友和劳工机构工作人员、学者推荐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最想说的是,在深圳听孙恒大哥的歌,改变了我的
人生观和人生道路,相信像我这样的不止我一个。2004 年刚上完技校的我,跟其他人一样来到了据说遍地是黄金的深圳,渴望能出人头地,干出一
翻大事业。本想挣钱的我,却被钱给挣了,所有青春的梦想和年华,被吼叫
的机器吞噬殆尽。思想在流水线上挣扎,身体被机器捆绑,每天都渴望睡
觉,同时又为争取加班而惆怅。在群居的宿舍里,排队、打水、刷牙,再一同
奔向各栋厂房,现实的打工生活驱散了往日的激情和梦想。回家也不是,城
市也待不住,打工的出路在哪里!我像一个病人一样到处寻找良医。偶然
的机会,遇到打工青年艺术团在深圳的巡演,当我听他们唱《打工打工最光
荣》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打工创造了那么多的价值,高楼大厦、生
活的产品,原来打工不是最卑微的。那一夜是我多年外出睡得最好的一夜,
我也变得自信起来了,打工没有什么不好,要打就打得有尊严,于是艺术团
的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像快要饿死了的病人,不断汲取打工的歌曲,诗
歌、戏剧、小品等新文化。《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让我看到:创造

我们的劳动文化就是在主宰我们的命运。

——东莞蓝衣公益 盘成芬

作为一个在工厂工作了五年多的工人，我已经在工厂资本的控制下慢慢地失去了更多的思考，只是本能地在重复地做着一些工作，慢慢地被很多规章制度束缚了，有时也会这样觉得：发生这些事情很正常的。但当我仔细地读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后，我的内心又澎湃了。书中有亲自到工厂的体验，有深入人心的点评，有很多个体的生命故事，也有很多的愤怒和质问。作为一本从工人角度出发写出的来自现实生活的这本书，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很全面地指出了我们工人面临的问题，独到的解析让我内心连连叫好，这是发自内心的，我也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失去思考，我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历史是由很多人的故事构成的，这本书也正是从工人的故事展开，形象生动，用大家的故事告诉我们背后的一些秘密和思考，当我们读懂了每个个体的故事，整体上认知达到一定程度后，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读这样的书可以对自己的处境有更好的认知，对我们思考问题的全面性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对这本来自于生活，又有独到解析的新书充满了期待，它值得我们大家用心去阅读，去感受！相信它会打动一些渐渐迷失的心！

——苏州某德资厂工人 王海军

我仔细读了书的前言，很受启发，原来“文化”是这个意思呀，也就是说文化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的事情，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文化”。本书中，

作者对于工人的感受的分析很透彻,在工厂文化那里也总结得很到位。认真看了几遍,没有太多的震撼,因为对于我们工人来说,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也许并不是麻木,而是这普遍而非正常的现象让人有着深深的无力感。不过书中的记述和分析还是让我有了许多反思。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已经是机器,而带着思考去做机器是会让你更痛苦,还是会从而努力地想要去改变点什么?在工厂没有名字对我们来说算是贬低吗,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代号有没有都无所谓?“让你不知情”造成的某种威慑和压力是否成了我们失声的重要原因呢?工具性的人是工厂的工具性管理造成的,还是因为工友之间不够信任才得到实现的?这种种问题让我们没有了自由,也没有选择可言,我们该怎么办?继续这样如机器一般活着还是反抗?是不是当我们不再懦弱,不再害怕丢饭碗时而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就能得到改变?

——深圳某连锁超市营业员 谢晓梦

读这本书,我和作者一起再次走进工厂,和工人们吃住生活在一起,感受他们内心的挣扎,再次通过作者朴实的语言看到工人们正在经历的遭遇。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工厂文化的压迫性和潜默化的描述和分析。虽然讲述的是他人的故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相似的脉络和命运。

——东莞烛光公益 宋刚虎

离开传统乡土社会的打工群体迅即进入世界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恰恰是被其对立面在资本全球化压力下为了全天候地占有劳动剩余而使工人“集中食宿在厂区”给制造出来的。可见,这部中国版的“制造

掘墓人”的历史活剧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中国人民大学 温铁军

读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后最深的感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目标,就是突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膨胀的学科方法,突破学院内知识与人的异化,勇敢地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农民共同体的建设。也就是说: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的方式之中。

——作家 张承志

本书以一个个细致感人的生命故事和缜密理性的文化分析对“中国新工人”这一群体的情感状态、生命要求以及内在的社会逻辑进行了全景式的探讨。“中国新工人”不只是悲情的一群,在不断迷失、绝望和受挫中,他们也在努力争取、开拓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命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梁 鸿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在革命成功后得以顺利建立,但其持续的存在却无法依靠单纯的政治手段,而必须凭借文化的力量。这既是因为所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畸形的生命价值观原本也是依赖于一整套的文化系统而存在,更因为社会主义的理念,绝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和政治手段上,更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基础(譬如所有制)就可以维系、持续。也就是说,无论是周建容大姐的自杀,还是昆山的爆炸事故,这些悲剧的根源都并不是作为整体的抽象的社会,它与人直接相关,是人酿成了人的悲剧,因为社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而文化正是将社会的人的观念和意识世界组织起来,并成

为支配性存在的重要力量。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郭春林

作为一位女性,吕途常年奔走在工业区、城边村和已经荒芜的乡村。无论在北方、在南方,她深入工友宿舍,访问工人生活,甚至自己还多次到工厂打工,来体验工友的工作和生活,把所见所闻所想汇聚成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充满了一个学者的感悟与体温,也充满了冷静的思考与真知。从某些个体的角度出发,推而广之到对整个现实的认知,吕途把这种研究方法叫“生命故事分析”和“文化体验”。她通过对工人阶级的现实境况的分析,看到了他们的迷惘和反思,也记录了工人文化发育成长的历史。她站在底层,站在草根上,她看到的東西告訴了她,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艰辛,为什么要寻找出路以及出路在哪里。理论是现实所需要的,理论更是理论的源泉,更需要实践的支持和验证。吕途的努力,证明了一个为学为文的道理:一部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就在于对真实生活的体味和解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回到现实实践中,来寻找生根的土壤、水和空气,牢牢站在大地之上,思想大树才能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

——中央党校 刘 忱

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新工人自己的歌和诗,以及他们挣脱束缚、实现自我的努力,手指翻过书页,头脑经历风暴,心灵深受触动。“唤醒”是近代中国宏大的历史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梁启超的“开民智”、孙中山的“唤起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鲁迅的“破坏铁屋子”到毛泽东的“唤起工农千百万”,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共和、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到

共产主义革命，一路走来，中国人“自我唤醒”的努力始终未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如此。前贤早已知道，唤醒之路无坦途，但他们更知道，只有觉醒的个体才是真实的，也只有面对真实的个体，才谈得到群体意识、主体性、文化和命运等大问题。用吕途的话来说，“让劳动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吕途的研究接续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将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唤醒史上之重要文本，而拥有持久、独特的价值。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胡一峰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是吕途书写新工人群体的第二本书。这一次，她依旧既是研究者，又是研究对象的同路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她的写作任务变得非常特别：不仅仅分析性地呈现这个群体的文化实践和当代境遇，更是用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召唤一种新的主体性，呼唤劳动者在世界中的新的位置和新的身份政治。理解了吕途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特殊的结合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她的字里行间里不仅有分析性的描摹，也充满了困惑、无奈甚至愤懑。作为对新工人群体在未来可能性的摸索的环节之一，吕途的写作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文本，甚至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她所探讨的新工人文化的问题，也同样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高度开放的问题，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新工人”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一个开放的概念。未来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群体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身份政治的有效事件。吕途的著作，本身也就是探索的一部分。

——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人类学系的在读博士生 战 洋

瞿师傅的故事（代序）

王小明

刚读完吕途这书稿的前一半，我就想起了瞿师傅。四十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家地毯厂当钳工，从进厂学徒，到离厂读书，整整五年，我都披披挂挂挂着一堆扳手、钳子，跟着他在机器间磨炼手脚。他是浙江衢州人，身板清瘦，收我为徒时才四十出头，却已经是八级钳工，在全厂技术水平最高，每月的薪水也最高，书记、厂长都是六七十元，他却拿八十六元。他不是党员，也非班组长，却很有威信，青年男工中，凡是有点骄傲、无意仕途的人，大都不同程度地以他为榜样，“瞿师傅说……”经常比“书记说……”更管用。

回想起来，瞿师傅是让我明白劳动是什么的第一人。大家常说“劳动创造价值”，他的工资单正是明证，他不是以党票、官职和学历，更不是以资金和裙带关系，而是以一手过硬的钳工技术，以日复一日的富含技术量的体力

劳动，挣得了全厂最高的工资。^{〔1〕}

不是所有的体力劳动都能挣到这样的工资的，钳工组长孙师傅，党员，矮墩墩的个子，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吝惜气力，却因为技术水平不高，工资就比瞿师傅少一大截。即便“文革”时代，在号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上海，至少在我们那个工厂里，工人的劳动报酬，依然是和劳动的技术含量成正比的。

瞿师傅一个人就可以造一台织毯机，^{〔2〕}事实上我头三年学徒，主要就是跟着他试造一台新式的织毯机。这是一种复杂的劳动，从画大张的结构图，到戴上面罩焊接零件，你都要会；这因此是一种综合的劳动，从如何组装传动大轴，到怎么加工长不及2公分的特殊螺丝，你都要心中有数；这也是一种自主的劳动，大致确定了工作目标和完工时间，以后的整个过程，都是你说了算；这更是一种创造的劳动，看着又高又宽的织毯机在自己手里一点一点地成形，那份满足和得意，足以压倒所有的疲惫和伤痛：我跟着瞿师傅干过许多通宵，也因为笨拙和疲劳出过一次工伤。

正是从这瞿师傅式的劳动当中，我真切体验到了劳动的多重含义。它经常是在制造某种物品，这些物品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至于是不是要将这制造说成是“创造价值”，我觉得应该斟酌，从今天的劳动状况来说，这样的说法似乎问题多多。但劳动也是一种教育，它不但让人焕发——如陶行知所说的——“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这样踏实健康的生活志趣，更让

〔1〕 从劳动价值理论所说的“价值”，到瞿师傅的工资，其间从抽象到具体的多个中介环节，这里都略过了。

〔2〕 这个“造”当然也包含选购合适的电机和找较大型的机器厂加工织毯机主轴这样的“非自造”部分。

人体验对自己身心能力的自信,不知不觉就会挺直腰板,自尊自爱。什么叫劳动光荣?不仅是因为它制造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更是因为它激发生活意义,让劳动者变得优秀!

不用说,这些都是现在的回顾,当初跟着瞿师傅干活的时候,我是不会去想“劳动是什么”的,当时根本不懂这个。但那五年的钳工经历,给了我许多结结实实的记忆,使我今天才能这么确信无疑,庆幸获得过那样劳动的洗礼。

但是,说大一点吧,最近大半个世纪的雇佣劳动的一大趋势,就是要在世界各地消灭“瞿师傅式的劳动”。这消灭的主要方法是发展一种技术,将综合复杂的劳动过程,分解为细小简单的劳动步骤,1900年代在福特汽车厂布成的那一条流水生产线,就是这技术的第一个大型产物。

这东西煞是厉害,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它都和瞿师傅式的劳动反着来:劳动不再有任何复杂的性质,它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工人也不再需要了解全局,你盯着眼前一小块空间就够了;自主是谈不上了,领班只需将流水线的传输速度扭快一秒钟,你就会紧张得放个长屁都不敢;跟创造更是不相干,你只是千百次地重复拧紧同一种部件上的同一种螺丝,时日稍久,你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

跟瞿师傅式的劳动相比,特别是在大多数单个的劳动环节上,流水线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了,所有以降低成本为牟利关键的企业和机构,当然热烈地拥抱它。但是,对那些被密集“种植”在流水线边的工人来说,这样的劳动却不是什么好事。他们的工资因此大大少于“瞿师傅们”,在今天,谁见过一个流水线的操作工比车间主任——更不用说厂长经理了——拿更高的工资?更重要的是,流水线是一所摧折心气的学校,它以各种齐整固定的噪

声持续地教训劳动者：你就是一具简单的机械，你毫无特色，随时可以被替换，就像是一粒灰尘，哪个角落里都有一大堆……

再年少气盛的青年，在这流水线上待得稍久一点，也会如屡遭老师轻蔑的小学生，不自觉地就垂头丧气、自轻自贱起来吧？

可是，今日中国大地上，稍微面积大一点的工业区，稍微“现代”一点的工厂车间，差不多都是流水线的天下。前几年我去看望瞿师傅，坐在他退休后亲手制作的全套木制家具中间，听他回忆昔日工友的近况：“现在都不做钳工了，都在屋里厢了……”

何止是工厂呢，从美式快餐店的汉堡生产程序，到中式连锁饭店的中央厨房，用生产福特汽车的方式制作食物的趋势似乎不可遏止；学校越来越多地变异为劳动力培训班，种种拆分教学环节，甚至将授课、评分和编教材完全隔开的分工程序，也正大行其道；甚至那历来被视为个体精神创造的最后堡垒的文学写作，也被创意产业大面积地攻陷，各种团队式分工—合成的写作模式，开始进入大学的教室，被唾沫四溅地推荐给跃跃欲试的文学青年……精神劳动的世界里，现在到处排开了流水线，“瞿师傅们”是应该待在屋里厢了。

流水线越是铺天盖地，劳动技能的分布就越失衡。跟着瞿师傅干的时候，我这么笨手笨脚的学徒工，也能一天天体验自己的技艺的进步，可流水线主宰的车间里，技术与操作工无缘，它现在是楼上白领技术员的禁脔了。电脑系统越发达，对有技术者的数量需求就越低，人数日众的“简单劳动”者，也越容易被机器手成批成批地取代。到了这一步，老板们就振振有词了：你们在生产过程中这么无关紧要，还好意思要涨工资？！

从这个角度看，我真是觉得，那种对复杂劳动大卸八百块的分解技术，

那些建立在这种技术之上、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的管理系统,那作为这技术和系统的绝佳体现的流水生产线,都是劳动和劳动者的大敌。正是在这些技术、系统和生产线的扩张之中,劳动者的处境持续恶化。不要以为这只是事关蓝领,这十年风头日健的许多“云计算”、“云管理”公司,都利用这种技术和系统,以远比蓝领车间苛刻的条件,雇用至少是数百万的零工,说不定——因为无从核实——其中还有许多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里为其24小时全天候工作,可都是干干净净坐着敲键盘,很白领啊!

今日中国,是世界上工业流水线最多的地方,大概也是各式非工业的流水线扩张势头最猛的地方,多半还是那种分工等于进步、效率就是生命的信念最为喧嚣的地方之一。正是在这些基本状况的配合之下,那些较为“上层”的社会弊端,例如吕途书中记录的企业野蛮管理和政府不作为,就发作得更为猛烈,对劳动者的身心和文化,造成深刻长远的伤害。^{〔1〕}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造和发展吕途所殷殷期望的健康开阔的新工人文化,恐怕就得同时在多个层面努力:既要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坚决狙击和缩小剥削和不公;也要在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持续促进民主、平等和解放意识的进步;更要在社会的深层结构方面,破除现代化的迷信,推进各种能持续促进劳动技术的普遍进步和均匀分布的劳动形式,重新激活劳动的正面教育功能。也许是太主观了,我现在愈益相信,一个社会的基本劳动形态,是决定这个社会有没有未来的关键之一。

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我要特别建议读者,请仔细地阅读吕途这书的后

〔1〕 举一个吕途在书中重笔描述的例子:以下三个因素——流水线式劳动,威逼利诱的加班制度,和工人的被迫频繁离职——的深度结合,造成了工友之间虽然长时间共处一个空间,却普遍少有非功利的交往,实质上形同路人。

半部分，此刻正在北京郊区那个嘈杂村子里慢慢长大的“公社”生活，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一种综合自主的新的集体劳动。最近两三百年来，很多中国和外国思想家，都憧憬过上午打鱼刷漆，下午沉思写作的自由世界，遍布全球的许许多多有志者，也此起彼伏地实践过或正在实践着这样的理想。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你从书中读到皮村的“公社”成员们，既是校长，也是司机；既是收货员，也是领导人；既是歌词作者，也是清扫工人……是不是觉得振奋呢？

一百年前康有为说，乌托邦并非空想，它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读完吕途记录的皮村故事，我觉得对，真是这样！

2014年9月 上海

序二 新工人群体的“罪与罚”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导读

苏州工友家园 全桂荣

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要写关于《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文字时，我潜意识里突然就冒出这么个有污名化我们新工人群体之嫌的词来，而且还觉得非此词不能准确形容当下自己对我们群体现状与未来的看法。

我们知道，新工人群体的诞生，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但如果仅溯源于此，我们就很难理解新工人群体以农村为故土的情结，以及城市人口高高在上的倨傲和自我优越感。

从1953年当时国务院的《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到1958年出台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发育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初衷是对城市“三无”人员救助的）到1989年《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等，无不透出国家对于新工人群体的过分“关心”。即使到了现在——2014年9

月,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壁垒森严,如北京对于新工人群体及其子女的各种“驱赶”手段依然在粗暴的进行中,新工人群体在户籍地与工作/生活地间的迁徙依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迁徙还要艰难。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身边也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在某地工作、生活了十几、二十、三十多年,依然只是“农民工”的身份,最多给个“新市民”、“新××人”的称呼,或者给办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居住证”,或者推行积分入户制度。如果没有对新工人群体历史形成根源的制度性有所了解,就很难知道新工人群体目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群体本身,更应该了解“制造”出我们群体演绎过程的制度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我们群体的应对策略。否则,很可能就会像《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所说的“中国打工者,不要等到打工者第三代才认清前进的道路”。那样的话,新工人群体所受的“罪与罚”将更多。

有个工友常在人前显摆自己是“老苏州”,的确是哇:他从1982年就从苏北某市来到苏州,可是苏州与他有一毛钱关系吗?三十多年来,除偶尔回老家外,他在苏州做了二十多年的建筑工,苏州有不少楼房他是建了又拆,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工地六人到十多人一间的临时工棚里,经常来个说走就走的搬“家”。老婆在儿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回老家了,这么多年来三口之家一直分居两地,这难道不是世间的悲剧?他现在还面临的尴尬是:没车没房没社保,人老了工作不好找,回老家也没人要,小生意不好做,怎么搞?

这样的例子在新工人群体中绝不是少数。我以前有个同事,夫妻俩从小孩将近一岁离家,六年来为省路费不敢回一次家;有个工友的孩子因父亲常年不回家,二十年来没叫过父亲一声爸爸,虽然他也跟父亲一样加入了“打工”大军;有个工友的女儿常年见不到父亲而有严重的抑郁症……本书中有两个